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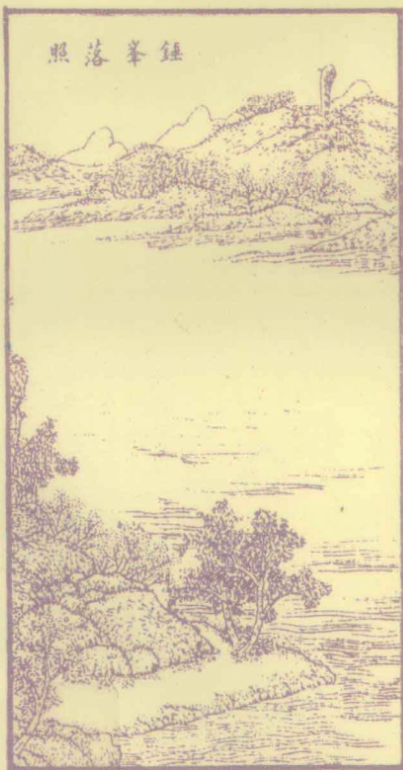
纪念承德避暑山庄建园 290 周年论文集

山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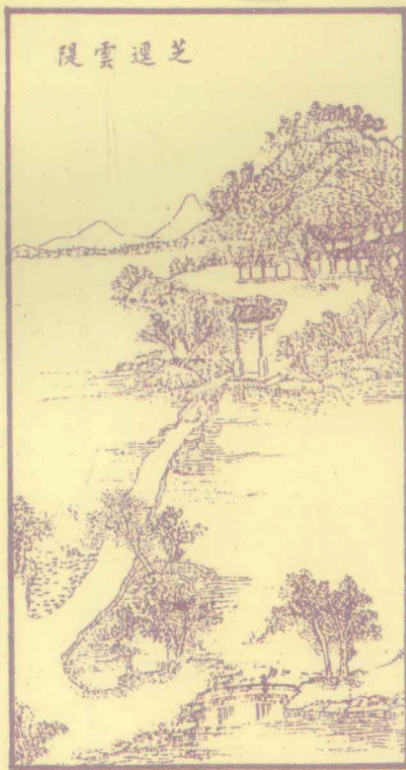
劉炳森署



鍾峯落照



芝蓮雲隈



目 录

在纪念避暑山庄建园 290 周年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上 的讲话(序一)	李月辉	1
在纪念避暑山庄建园 290 周年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上 的开幕词(序二)	周金生	5

宫廷历史

避暑山庄和康乾盛世	戴逸	7
《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	冯尔康	14
康熙皇帝与避暑山庄	孟昭信	20
读朴趾源《热河日记》	郑克晟	30
避暑山庄与清代前期的政治活动	庄吉发	42
从康乾盛世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所引发的设想	张广恩 姜相顺	71
乾隆发迹与避暑山庄	于善浦	79
康乾盛世与避暑山庄清音阁	刘玉文	83
唐英旗分辨正	孙文良	101
清代大蒙古包宴	张占生	107
康乾时期承德避暑山庄经营思想的发展	姜舜源	121
试论康乾盛世承德外八庙设计中对统一向心思想的含蓄表现	张斌翀	133

皇家园林

从避暑山庄想到木兰围场	侯仁之	143
-------------------	-----	-----

从避暑山庄的设计谈起	张开济	145
避暑山庄兴衰与承德市的变迁	杜江	151
再论避暑山庄的历史价值	张羽新	159
康熙和乾隆营建的避暑山庄假山景色	李凤桐	182
避暑山庄盛期园林植被特点及恢复途径	韩志兴	195
承德及其皇家遗产保护和发展的 一些计划	(英)杰拉尔德·迪克斯	212

民族宗教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驻藏大臣奏折介绍	王尧	224
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	王思治	237
乾隆经营西藏与避暑山庄	罗明	255
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发	马汝珩	成崇德 267
十九世纪末承德的 城市与居民	马大正	286
避暑山庄——康乾盛世的杰作	李治亭	295
承德开发探微	杨天在	309
浅谈章嘉活佛与“康乾盛世” 外八庙的关系	陈振远	李海涛 323
从承德皇家寺庙看康乾民族政策	马秀英	331
六世班禅与须弥福寿之庙	郭美兰	339

在纪念避暑山庄建园 290 周年 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序一)

中共承德市委书记 李月辉

这届以“康乾盛世与避暑山庄”为主题的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今天在这里开幕了。这是避暑山庄研究的一次盛会。

1983 年承德召开避暑山庄建园 280 周年学术研讨会之后的 10 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避暑山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丰富了中国清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各界人士认识避暑山庄多方面的价值，加速山庄保护、利用的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促进我市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我对各位专家、学者此间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对专家、学者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表示热烈祝贺！

今天，各位专家、学者带着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聚集一堂，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这对于进一步发掘避暑山庄政治、历史、文化包括造园、古建、宗教、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提高国内外各界人士对山庄的关注与认识，以期更好地保护、利用它，发挥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作用，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次会议在承德召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承德的发展与避暑

山庄紧密相关。承德虽然具有悠久的人文历史,但在避暑山庄兴建之前,它还仅是个“名号不掌于职方”的游牧之地。随着避暑山庄的兴建与利用,承德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城市规模也迅速扩大。到山庄建成后的第四年,康熙即有“聚民至万家”的诗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象。半个世纪后,承德已经达到了“户口日滋,耕桑益辟,俨然一大都会”的盛况。新中国成立后,山庄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61年,山庄即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展了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改革开放十五年间,承德市借助文物资源所带来的旅游优势,加快了社会、经济的发展。1978年,国务院批准承德市对外开放。此后,承德市连获桂冠:在获得国务院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国四十四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全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等四项桂冠之后,近年又获得了全国卫生城、全国双拥城等新的桂冠。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同步发展。承德不仅成为河北省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而且成为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但是承德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特别是如何借助文物资源优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认为,承德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借助旅游优势工作的不断加强。而要加强这项工作,首先有赖于对山庄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化。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深化对山庄的研究,其意义不仅仅限于更好地发挥和利用旅游优势来发展地方经济,加强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而更在于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新形势下整个中华民族两个文明的建设,进而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贡献力量。

诚如各位所知,避暑山庄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决定了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的。齐心协力把它推向世界,是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义务。江泽民总书记到承德视察工作时曾指出,避暑山庄“很值得研究”。在避暑山庄建园2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戴逸先生也曾提出“应该建立避暑山庄学”的意见。就个人的理解,我认为,山庄的价

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它的政治历史价值。曾经有一位西方美学家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而避暑山庄首先是一部凝固的历史。在这个艺术整体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深刻的治世思想，凝聚着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进程，是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山庄的建造本身，就是清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政治目的的体现。整个避暑山庄的景物布置“均依圣心指点而成”，“一花一木之经营，俱见主人之胸臆”。避暑山庄的盛衰同时也是清王朝盛衰的缩影。在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过中国的历史。

二是山庄的文化价值。避暑山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它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突出表现在“三个集大成”上。也就是，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大成，古建筑艺术之大成，宗教文化之大成。

东方自然式山水园与西方几何规划式园林的创建与发展，形成了世界两大园林体系。康乾盛世推起了东方古典园林艺术最后一个高峰，产生了避暑山庄这样空前的园林艺术作品，对中国古典园林的以人为之美入自然、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以及静观、动观、借景、透景等造园意境和各种造园手法作了全面的总结、完美的概括和最大限度的发挥，使避暑山庄成为 18 世纪东方皇家宫苑的代表作。清代文人张玉书在《扈从赐游记》中称道“宇内山林无此奇胜，宇内园亭无此宏旷”，确非溢美之词。

木构建筑与砖石结构建筑是东西方古典建筑两大体系。避暑山庄则把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推上了最后一个高峰。同时，它还在木架结构与砖石结构的完美结合、建筑形体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丰富的建筑形象与深刻的建筑内涵的和谐统一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技巧进行了一次百川归海式地总结与创造性地运用，使之成为东方古典园林建筑的典范。

山庄外庙，还充分体现着清代帝王的宗教思想及其运用宗教的政策与策略。清帝把俗称中国三大宗教的儒、道、佛融和在一起，在尊

儒为正统,宣扬“君权天授”的同时,又宣称自己是“无量寿佛”和“文殊菩萨”的化身,以示“君佛同体”。在造园和建筑上,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道教阴阳五行的学说与佛教的曼陀罗相宜为用,使山庄外庙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集合体。

恩格斯曾经说过:“希腊建筑如灿烂的、阳光照耀的白昼,伊斯兰建筑如星光闪烁的黄昏,哥特建筑则象是朝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避暑山庄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及其园林、建筑艺术发展史,从黎明到黄昏全部过程的反照与缩影?山庄自身的价值,已经充分证明,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了解了山庄,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的文化。因而,我们对各位专家、学者和一切关心山庄的朋友寄予厚望,希望大家确实能够把山庄作为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来对待,去发掘它,研究它,宣传它,使世界关注山庄,使山庄走向世界。通过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的共同努力,把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

研究避暑山庄不仅要以山庄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必须从大背景、全方位、多层次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所谓大背景,就是要把产生山庄的国内条件与当时的国际背景相联系,与同期的世界代表性建筑相比较,借以发掘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价值。所谓全方位,就是从政治、历史、文化,包括造园、古建、宗教、文物等各个领域去研究它,从各学科、多角度去发掘山庄的价值。所谓多层次,就是既要有国际水准、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又要有服务现实的应用研究,既要有不断深化的学术研究,又要有普及性的宣传内容及宣传方式的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十分艰辛而又繁重的工作,需要各位专家、学者和朋友们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在这里,我对大家已经付出、正在付出和将要付出的劳动表示衷心地感谢!并且,期待着把避暑山庄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纪念避暑山庄建园 290 周年 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序二)

中共承德市委副书记 周金生

自 1703 年开始,避暑山庄已经伴随着历史进程度过了 290 个春秋。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和承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今天在这风光秀美的烟雨楼开幕了。这不仅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而且标志着避暑山庄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史研究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康乾盛世与避暑山庄”是我们这次学术研讨活动的主题。参加今天研讨活动的都是国内外在研究清史与避暑山庄、中国古代园林与建筑艺术、边疆历史、民族宗教和文物等方面,颇有成就和造诣的著名专家。特别是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的著名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台湾、香港的著名学者不辞辛劳回到大陆,来参加这样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盛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名誉会长阿沛·阿旺晋美同志和有关各级领导莅临会议,无疑为这次活动增添了光彩。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专家,已经和正在为清史与避暑山庄研究,为避暑山庄及其外八庙多方面价值的开掘与利用,为今日承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为此,我们对老朋友和新朋友的到来倍感高

兴。对大家付出的心血、取得的成果和作出的贡献，充满感谢之情。

众所周知，避暑山庄是康乾盛世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产物，而承德又是一座依附于山庄而诞生，并不断发展的城市。这里地处冀北，南邻京都，山川秀丽，气候宜人，不仅是难得的旅游避暑胜地，而且曾经是中国的第二政治中心。现在依然是燕北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也正是由于避暑山庄的存在，这块土地才获得了殊荣。如今，承德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全国 44 个风景名胜区之一，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中国旅游胜地 40 佳之一。承德避暑山庄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它的产生及其价值体现，不仅与清王朝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而且与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乃至世界文化体系紧密相联。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必将对承德文物资源的利用和旅游优势的发挥，对承德更有效的向世界开放，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和深刻、积极的影响。

各位专家为这次学术活动带来宝贵的研究成果。这次提交研讨会的数十篇论文，对于避暑山庄的政治、历史、美学价值及其地位，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历史成因、营造过程及其作用，承德人文景观的保护、利用及其发展等重大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这些探讨及成果，标志着避暑山庄研究的新水平，及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重大开拓。我们把这些论文汇集成书，印发国内外，借以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承德，推动清史与避暑山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避暑山庄和康乾盛世

戴 逸

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距今已290年。它地处燕山山脉,风景秀美,山川雄奇,气候凉爽。附近河流纵横,林密草长,兽群出没,是理想的牧区和猎场。清朝建立避暑山庄,经康熙、乾隆两朝的营构扩充、踵事增华,楼台翼然,花木繁茂,寺庙宏大,成为塞北草原上的璀灿明珠,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十分浓郁、丰富、它是包孕着历史、文化、民族、宗教、建筑、园林等在内的大型综合性的博物馆,有充分的研究、开发价值,也可以结合旅游服务,发展旅游文化,在人们观光游览的时候,给人以历史知识和文化陶冶。十年前的1983年,在承德举行纪念避暑山庄2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建议建立和发展避暑山庄学,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建立机构,研究问题,使这一涉及多种学科的“山庄学”得以成长,并取得长足的发展。我相信:这对继承祖国历史遗产,宏扬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学术研究,发展旅游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避暑山庄不是一座普通的园林,它和清代康乾时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密切的联系,其地位十分重要。康乾时期,

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是把处于纷争、散漫状态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并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一历史任务的执行和完成，出现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繁荣盛世，避暑山庄正是康乾盛世的历史见证。一到承德，看到许多建筑、景点、器物、碑刻，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二、三百年前的历史环境中，看到我们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事业和文明成就，看到祖国逐步形成多民族泱泱大国的漫长里程。在这里，您能感觉到历史脉搏的跳动，想见往事陈迹的影踪。据此而进行思考，得出您的体会、感受和判断。

统一，这是十分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话题。统一才能够保证国力强盛、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深受割据战乱之苦的老百姓企盼统一，为实现统一而努力奋斗。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即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但统一巩固的程度，各个朝代很不相同。在清朝以前，统一的程度并不很牢固，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经常发生分裂、割据、对抗。在中国历史上贯串的主线之一，就是居住在中原的农耕民族汉族，和居住在北方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秦汉以前，北方的匈奴雄据塞上，和中原王朝发生长期斗争，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中原地区建造长城以防御匈奴南下。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许多少数民族长驱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地方政权，争战不息，称为五胡十六国，干戈扰攘数百年。唐朝是强盛的王朝，但仍不时和突厥、回纥、东胡、吐谷浑、吐蕃等作战。宋代有契丹、西夏、女真、蒙古，边患不已，这些少数民族建立了辽、夏、金、元王朝，与宋王朝长期对峙，最后，元朝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国内的民族对抗和战争是重要的主线之一，反复出现，史不绝书。明朝，北方的游牧民族仍是对中央王朝的重大威胁，明朝中期、后期，中央王朝力量较弱，许多边陲地方在其有效控制之外，北部和西北仍为蒙古所控制，厄鲁特蒙古长期为明代边患，在著名的土木之战中曾击败明军，俘获了明朝英宗皇帝；漠南的察哈尔蒙古也具有强大实力，明朝岁致银币缎帛，以求和平；东北则满族崛起，并吞各部，屡败明军，统一了东北广大地区，

翼翼然跨越长城，问鼎中原。还有西南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的许多地方，土司林立，互争雄长，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台湾则在明末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侵占。明朝末年，环顾宇内，明朝中央实际能控制管辖的是内地十三布政使司。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中央号令不及，或者处于对立关系，明朝驻军筑城，防其进攻，或者实施羁縻政策，封以职衔、赐以币帛，作笼络之计，统一的程度很不牢固，离心的倾向相当严重。这时已经到了十七世纪，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正一日千里，迅速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已将其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中国内部民族冲突激烈而频繁，分崩离析的状况，相当严重，不改变这种状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外国资本主义提前两个世纪入侵中国，那时候中国内部统一凝聚的程度很脆弱，全国一盘散沙，互相争让，缺少可以团结全民族的政治中心，在外国的武力侵略下，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很有可能四分五裂，豆剖瓜分，出现极严重的后果。

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入关，改变了内争不息的情况。顺治和康熙初年，削平了南明的反抗和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这时已进入“康乾盛世”，在一百多年时间内，清朝除发展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外，致力于经营北部、西部和西南边疆，在辽阔的疆域内重新统一中国，促使全国各民族的和解与团结，其功绩是伟大的。而且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从前，在汉唐盛世，也管理着辽阔的边疆地区，但设置的是都护府之类带有军事统治性质的机构，或是设立若干羁縻官职，仅是象征性的统属关系。而清代在边疆地区，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立将军制、盟旗制、伯克制、郡县制，或设立驻藏大臣、办事大臣，实行军政和民政管理，清朝的号令，可以有效地贯彻到全国。无论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原的汉族、或西南的山地民族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尽管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仍然存在，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全国各民族从隔离、对抗开始走向共处、和解。从前，南北民族往往以长城为界，互相仇视，彼此攻战。康乾时期，长城不再起隔离和防御作

用，而变成供人凭吊观赏的古迹和风景区。康熙帝在诗中说：“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不再需要以长城的险隘作为防卫，在清朝统治下，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地区，成为友邻。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建立起秩序，这是清朝康乾时期的伟大成就。尽管这种成就也是通过血腥的战争，镇压了各种反对势力而取得的。但如果对比十七世纪初明朝末年时边疆地区的情形，其进步之巨大是显而易见的。统一代替了分裂，共处代替了战争，安定和秩序代替了干戈相寻，扰攘不宁，经济的初步发展代替了贫困匮乏。康乾时代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解、版图的奠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这样，此后，中国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大敌当前，国势险危，但全民族都能团结一心，风雨同舟，并肩作战，共御外侮，帝国主义才不可能瓜分中国，不可能灭亡中国。

清代康乾时期如何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当然，军事手段是很重要的。对于妨碍、阻挠统一的分裂势力，不能不临以兵威，扫除国家统一、民族和解道路上的障碍。康乾时期，对准噶尔蒙古进行了长期战争，这是实现统一的关键。清朝初年，准噶尔已发展得十分强大，它居住在伊犁河谷以至中亚细亚，征服了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曾经攻入西藏杀拉藏汗，控制了青海各部，又打败喀尔喀蒙古，蹂躏漠北草原，准噶尔的上层贵族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安定和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彻底打败准噶尔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才能巩固，全国的统一、团结以及边疆的安宁才能实现。

清朝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延续七十年之久，简单说来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几次重大而激烈的战斗。第一阶段在康熙中期。准噶尔汗噶尔丹对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发动袭击，喀尔喀战败南走，投奔清廷，请求保护。噶尔丹的铁骑南下，至乌兰布通。当时康熙正为反对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而进行斗争，清军在雅克萨打败了俄国入侵者，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使东北边境安定下来。翌年（1690年），清军在

乌兰布通迎击噶尔丹军，击退其进犯。此后又鏖战多年，噶尔丹身亡。这一阶段的战争，打击了骄横的准噶尔分裂势力，保护了内外蒙古的安全，建立了漠南漠北广大地区的正常秩序。

清军第二阶段的军事行动在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准噶尔蒙古继起的领袖策妄，乘西藏内争，派兵侵入西藏，杀拉藏汗，烧杀劫掠。康熙迅速调遣大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以后又连年征战。雍正初，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又于雍正九年、十年，与准噶尔战于和通泊、光显寺，这阶段的军事行动虽互有胜败，但清军毕竟制止了准噶尔的进攻，安定了西藏、青海与喀尔喀地区。雍正末年，双方经长期战争，力量消耗甚大，议和停战。

第三阶段军事行动，发生于乾隆中叶。当时准噶尔部达瓦齐新立为领袖，连年内讧，其重要将领和许多部落，纷纷投向清廷。清军乘其内讧的机会，派兵进入天山以北，攻克伊犁，俘获达瓦齐。接着，准噶尔的另一个领袖阿睦尔撒纳继起作乱，清军再次出击，打败阿睦尔撒纳。此后，清军又南取叶尔羌、喀什，平定大小和卓的割据，统一了天山南北，彻底扑灭了准噶尔分裂势力，解除了蒙古、青海、西藏、甘肃所受的威胁，巩固了版图，确立了近代中国统一的格局。

清朝为实现统一进行了长达七十年的战争。当然，统一得以巩固和长久并非仅仅依靠军事行动所能获致。在战争进行之际和结束之后，清朝实行了大量政治措置、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制定了比较系统而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加强对边疆和民族地区的管理，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生产，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习惯，其基本方针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笼络团结各民族的上层人士，根据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不同情况，进行统治和管理。各个少数民族团聚在清政府周围，出现了长期和睦共处与交流往来的局面，逐渐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中的稳定与团结，奠定了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规模。这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残酷、激烈的战争，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并进行长期艰苦工作和惨淡经营的结果。

就在康乾盛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开始建立，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而木兰围场比山庄建立还要早二十多年。其建立除了皇帝和王公大臣们避暑、消夏、娱乐之外，还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代削平南方的三藩之乱后，北方形势告急，俄国在黑龙江上大肆烧杀，准噶尔蒙古骚扰各地，康熙帝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方。就在康熙二十年，清廷在原属蒙古喀喇沁部和翁牛特部的地区内设置木兰围场，其目的是“习武绥远”，也就是训练军队，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当时，康熙帝已经常来到这里，清军在黑龙江上与俄国作战，很多军报文书直接传送到这里的行宫。1689年中国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使团从尼布楚返回，首先来这里的行宫，向皇帝报告谈判情况。1690年，清军和准噶尔的第一场决战乌兰布通即离木兰围场不远。1691年，对团结蒙古族具有重大意义的多伦会盟就在围场附近举行。所以在避暑山庄建立以前，康熙帝经常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逐渐形成了指挥枢纽。在避暑山庄建立以后的一百年内，康熙和乾隆经常到山庄来，康熙晚年每年到口外来，有时一年来两次。乾隆在位期间，到避暑山庄五十三次。在此召见少数民族王公，接待外国使节，举行木兰秋狝，整军经武，乾隆帝还经常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生日（阴历八月十三日）。因此，康乾两代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在避暑山庄留下了痕迹。可以说，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是康乾时期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产物，出于进行军事行动和团结蒙古族的需要。它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见证。

为什么康熙要选择承德这块地方来处理军政要务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地理位置而言，避暑山庄地处北京与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围场以北是科尔沁草原、乌珠穆沁草原、上都牧场，牧草茂密，牛羊肥壮，南接华北平原，耕田鳞次，农业发达，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地方，又是自古以来军事要冲。而且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森林复盖率高、自然环境优越。当年，少数民族不习惯北京的环境，居住北京，容易感染天花，损害健康以至夺去生

命。清朝两位年轻的皇帝均因出痘而早逝，清初战功卓著的豫亲王多铎以及乾隆时到北京入觐的六世班禅亦均感染天花而身亡。在当年的少数民族中，天花是极严重的恶疾，几乎谈虎色变。为了保护少数民族的健康，凡是已出过天花，取得免疫力的人，叫做“熟身”，可以进入北京；凡是未出过天花，没有免疫力的人，叫做“生身”。皇帝轮流召见少数民族王公，“熟身”在每年年底到北京觐见，称“年班”，“生身”在每年秋季到避暑山庄觐见，并随同围猎，称“围班”。清廷对随围的蒙古族官兵十分礼遇，赐宴款待，赏给衣服、靴帽、绸缎、布匹、刀枪弓箭以及金银珍玩。每次清帝出巡行围，附近数百里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携带全家妇孺，赶着牛羊驼马，在围场附近设帐驻居或随同行围，或等待召见。可见避暑山庄的建立为联络、维系少数民族提供了适合的场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避暑山庄毗邻的木兰围场，地方广袤，林深草密，鹿羊成群，熊虎出没，是非常理想的猎场。康熙、乾隆都很注意满洲八旗官兵的习武传统，强调骑马射箭。每年木兰秋狝，是练兵的好机会，康熙说：“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校猎纪律，自当严明。”随围的官兵，包括满蒙八旗，每次参加者少则数千人，多至二、三万人。他们经过艰苦的行军，激烈的追逐，紧张的驰骋，顶风冒雨，戴月披星，得到了近于实战的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和顽强意志。康熙帝十分重视木兰行围的作用，他说：“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他列举多次和准噶尔作战取得的胜利，认为即得力于木兰行围，“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者，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由此可见，清代康乾时期，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的创设和发展，并不仅仅由于该地风景雄秀、气候凉爽，可以消夏娱乐，更重要的是联络蒙古，团结少数民族，整军习武，训练官兵，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 史料价值

冯尔康

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很有史料价值，为研究它的作者康熙帝和乾隆帝历史的一些侧面所不可忽视。笔者草此小文，旨在简介它的面貌及其对研究康、乾二帝历史的作用。

康熙帝建设承德避暑山庄，内有 36 所建筑群，他为每一处所写一首诗词和小叙，又撰《避暑山庄记》，于康熙 50 年（1711 年）书竣，次年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等为诗作出注释，内阁侍读学士沈瑜为每一处所绘成图画，与康熙帝诗词相配合，于是《御制避暑山庄诗》书成。乾隆帝于乾隆六年（1741 年）巡幸热河，重读康熙帝诗，依韵唱和，成诗词 36 首，大学士鄂尔泰等对之加以注解，使该书成为《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

该书内含康熙帝的“山庄记”，乾隆帝的“序”，康、乾二帝的诗词及诸臣注、图，监刻职名和揆叙等、鄂尔泰等分别写作的“跋”。全书分两卷，并有汉、满两种文字的本子。

该书有多种刻本。笔者所见，有康熙间内府套印本，分装四册，书题《御制避暑山庄诗》；香山徐氏摹本，大同书局石印，书题《御制避暑山庄图咏》，其间又有线装二册和线装一册的两种本子，盖因字体大